

人道年獎

在盲、聾或四肢傷殘等殘缺中，聾人似乎最易被忽視；外表四肢健全，大大隻隻行得走得，有誰會想到你身體有問題？

剛獲「香港人道年獎」的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鄧慧蘭不是聾人，卻在偶然機會下，發現傳統學習口語的方法千瘡百孔，聾人只能更加與世隔絕，永遠生活在社會最低層，「有些聾人說話、手語、書寫全都不懂，怎和人溝通？好多都找不到工作。」

她深入研究手語，發現和中、英文等口語有相同的語言地位，可是口語教育流傳百年，誰也沒上過心去改革，一副干卿何事的冷漠；她孤身領軍打仗，學校怕趕客不願配合，她東奔西跑，自行找資源。

她主張打破主流學校的聾人教育，讓小孩同時得到手語和口語發展，讓他們從此能在無聲的世界裏，以手代口，暢所欲言。



▲ 憑着多年來為聾人付出的努力，她（左二）上月獲得「香港人道年獎」，「始終是個很新的教育模式，還有很多改善空間。」

沒

有了聲音，人與人的溝通，靠的是眼神和動作。要讓失聰幼

童坐下來拍照，說話、拍掌都沒法吸引他們注意，鄧慧蘭熟練地把拿着玩具的手移到小孩面前，讓他看見了，便乖乖坐下來。

坐下、吃飯、睡覺等簡單的意思，用肢體語言不難表達，但要在無聲世界暢所欲言，鄧慧蘭覺得手語是最直接的方法，她為有聽障的嬰兒開設手語班，讓小孩在學前就接受手語教育，以免錯過最好的學習時機。

她流暢地跟聾人談話說笑，又替記者繙譯聾人手語代表的意思，「豎起兩隻手指公，他們說多謝呀。」不是她開口說話，旁人或會以為鄧慧蘭也是聾的。

鄧慧蘭一直研究語言，對無聲世界感興趣，似有點格格不入，卻原來語言學家認定人生下來，總有一種屬於自己的語言可供溝通，但她發覺聾人竟然沒有。

記者以為，但凡聾人都懂手語，原來是錯的，香港十五萬聽障人士中，懂手語的只得八、九千人。

有手語卻不學，大部分聾人的口語都說得一嘴嘒，外人根本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。

對一個語言學家來說，聾人的「溝通語言」如此不濟，絕對是學術震撼，令鄧慧蘭決心以此做研究。

七之戰

慧蘭

做着代表快樂的手語，鄧慧蘭最希望看到聽障學生能快樂地成長，「希望將來有一批快樂、健康的聾小朋友，能考入大學。」





李菁自殺成推動力

十多年與聾人的相處，其中最令鄧慧蘭印象深刻的，是在〇八年自殺的聽障人士李菁。「她寄了一封英文電郵給我，未見過土生土長的聾人有咁好的英文，便請了她到研究中心工作。」可惜七個月後，她自殺身亡。

鄧慧蘭後來閱讀她的網誌，才明白她心中的痛苦，「她在網誌內說『點解個個叫我唔好學手語？點解在中心用手語的人都很開心而我不是？』她能夠大學畢業已經好叻，但仍走上這條路。」這件事令她更堅持要為聾人工作，「要令在主流學校讀書的聾學生讀得開心。」

游說了幾個月，他終於答應，可是大學卻說不能請，「大學請一個研究助理都要學士畢業，他連會考也沒有，大學說無職位適合他。」

鄧慧蘭決定為他開口力爭，「說沒有他就做不到研究，日日寫文件跟大學理論，幸好大

▲李菁（右）自殺，除了令鄧慧蘭更堅定為聾人教育努力，更使李的胞姊李鶴成立了慈善團體「鑑耳」。

家長不想孩子學習手語，或多或少是怕標籤效應，怕旁人一看手勢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失聰，「主流學校沒有手語課程，即使在聾校，也不用手語授課。」結果聾人既不懂手語，也學不到口語，「有些連寫字也不行，沒法和別人溝通，只能留在家中，很可憐。」

她認識一些失聰父母，同樣不想兒子學手語，結果一家三口連溝通都有困難，兒子只能留在家中做家務。

家長不想孩子學習手語，或多或少是怕標籤效應，怕旁人一看手勢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失聰，「主流學校沒有手語課程，即使在聾校，也不用手語授課。」結果聾人既不懂手語，也學不到口語，「有些連寫字也不行，沒法和別

人溝通，只能留在家中，很可憐。」

鄧慧蘭更堅定為聾人教育努力，更使李的胞姊李鶴成立了慈善團體「鑑耳」。

無心插柳

為聾人而戰，本是無心插柳，「九〇年入中大工作時，隔籬位是位美國學者James Woodward，他問我知不知道甚麼是手語。」對方說手語是語言的一種，研究語言學的她並不相信，「覺得只是把廣東話轉成手部動作，不信它有獨立的語言系統，想了解多些。」

要研究手語，得找一個熟悉手語的人，「有同事在巴士站看到有個聾人每天和姐姐用手語溝通。他父母都是聾人，由小到大都用手語，想請他到大學教我手語，和我做研究。做手語紀錄要拍片，他起初覺得尷尬，不肯做。」

▼手語研究中心內，還有一班來自亞洲的聾人，「他們來中大讀書和做研究，學費和住宿費是全免，他們也說從沒想過可以來到大學工作。」



▲鄧慧蘭（右三）的一對子女現已十七歲，自小就跟媽媽與聾人相處，「〇四年到荷蘭考察三個月，順道帶她們去看看世界，又可以和聾人相處。」

學也知我不是玩，最終遷就。」

鄧慧蘭這一爭，從此改變這個助理的命運，「他本來口語講到一嘴嘴，在聾校畢業後只能在工廠工作，每天在電腦房站上八小時影印。現在成了得力助手。在辦公室加張枱，每日上班和他用手語交談，鑽研手語的語言特質是甚麼。」她的研究漸有所成，外間都認定她是手語專家。

做研究的同時，她鼓勵助理重考會考，希望他找到更好工作，「找人教他，但考了三、四次仍不合格，更喊着說自己讀不到書。」她明白少年讀書黃金期早已過了，勉強不來，只好放棄。

這時她萌生幫助這群聾學生的想法，「是聾人教育出了問題，不如從語言着手，搞得掂教育，就幫到很多學生。」

聾人聽不到聲音，學口語自然困難重重，她深信手語有用，

○三年跟教育局合作，由她帶一班聾老師到聾人學校，以手語給學生講故事，「用手語幫小朋友表達，他們由不懂寫字到一句一句地作文，變得喜歡看書，有很大進步。」



為了學到更多語言教學技巧，她八五年到愛丁堡大學修讀應用語言學，更讀至博士畢業為止。



聽障人士聽不到聲音，但鄧慧蘭相信他們自有一套溝通能力，「人腦喺度，無理由學不到語言；如果他們學不到，我就去令他們學到。」



可惜實驗計劃做了三年，學校還是放棄，「學校不想做，驚手語趕客」。她深深不忿，轉向賽馬會申請資助，到有聾童學生的主流學校教，「如果學校能集合幾十個聾學生，額外聘請聾老師，學生一定有進步。」不過，學校多喜愛招收成績好的學生，要找到願意取錄大批聾學生的學校談何容易？

她是天主教徒，想起可到教區辦事處游說，結果憑她三寸不爛之舌，成功游說聖若翰天主教小學，自〇六年起每年接收六個聾學生入讀一年級，與一般學生一同學習，「他們很開心，手語、口語都不怕用，現在連健聽學生都學懂了手語。」

聾人教育偏向口語而非手語，源於一八八〇年國際聽障教育會議的主張，鄧慧蘭卻反其道而行，「靠科研及理論分析出來，雖然我覺得行得通，但還是很擔心，怕聾童學習了無用，依然不肯說話。」

幸好她的努力沒有白費，「二〇一〇年參加聾人教育會議時，聽到籌委會為一八八〇年定下的主張向全球聾人道歉，呼籲將來的聾人教育要有手語，個心終於定了，證明無行錯路。」

她還有一個目標，是希望聾學生能考入大學，先後替他們開設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，「讀了五年，已經有讀大學的資格，但還未能替他們找到適合的課程。最想看到有聾學生大學畢業。」

鄧慧蘭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傳統，不一定是法

▲ 鄧慧蘭發聲失聰小孩的弱項在於語言，希望他們透過閱讀故事書改善問題，「香港沒有這類書，所以自行研發了五十本，健聽學生也可從中學到